

本期专题·5G技术

- 02 5G全球争夺战
- 06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 09 任正非：用中式思维去理解西方是盲目自信
- 12 中国与世界的软实力沉浮录

政坛经纬

- 15 21世纪国防新思维与中国对策

历史深处

- 18 41年前，高考恢复

悦读时光

- 封三 南京大屠杀公祭日：以国之名 永远铭记

编者按：12月6日，应美国法院的要求，加拿大政府拘押了华为的CFO孟晚舟，由此引发轩然大波，中国政府对此发表严肃抗议声明。11日下午，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的法官宣布，准许孟晚舟女士获得保释。回归事情的本质，这是在全球5G竞赛的背景下发生的，美国政界对华为如此不友好，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美国正加紧对5G主导权以及对全球科技制高点的争夺。

在5G技术领域，美国起步较早，也拥有高通、思科等技术积累较深的公司。多年来，美国在开发5G方面主要采取与欧洲捆绑的模式，在5G关系网中的大部分模块里，美国和欧盟仍占据主要份额。但尽管如此，美国在这一日趋激烈的竞赛中已显得十分焦虑。有分析认为，正是担忧在5G等重要技术领域的大国竞争中丧失“霸主”地位，才令美国将他国科技企业当成了“打击对象”。

5G被广泛认为是下一代信息技术的通讯基础，是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一轮科技革命继续发展的基础性支柱。相比之前的无线通信技术，5G可能改变当前信息数据传输的基本业态，对wifi、红外遥控、室内宽带等进行替代，是具有战略平台意义的核心技术。当前中国、日本、韩国、美国、法国等信息产业较为发达的国家都希望在这场竞争中占据主导权，或者至少避免被其他国家落下。

5G技术的竞赛实际上是大国科技竞争的缩影之一。多年来，科技竞争始终是大国竞争的重要内容之一，工业革命以来，这种竞争显得更加明显、也更为重要。冷战前，各国科技竞争主要体现在军工领域，以先进武器作为主要角逐目标；冷战后，各国的竞争转向产业链竞争、核心技术竞争以及企业之间的终端产品竞争。

本期推出“5G技术”专题，从5G技术的未来潜力、5G的社会意义、5G的产业链等方面，分析华为受压的前因后果，深刻反思我国核心技术领域的研发机制、人才机制、产业机制等，以及核心技术对于我国在世界舞台上把握话语权的关键性和紧迫性。希望为您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信息。其他栏目的文章也期盼引起您阅读的兴趣。

主 办：盐城市图书馆
刊头书法：臧 科
主 编：戈建虎
副 主 编：张安红
责 编：王智芹

地 址：盐城市城南新区府西路6号
邮 编：224005
电 话：0515-69971581 18751431986
邮 箱：417967615@qq.com
网 址：www.yctsg.cn

设计制作：盐城市圆融数字印刷有限公司



5G 全球争夺战

12月6日,应美国法院的要求,加拿大政府拘押了华为 CFO 孟晚舟,由此引发轩然大波,中国政府对此发表严肃抗议声明。11日下午,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的法官宣布,准许孟晚舟女士获得保释。

事实上,美国对华为的不友好早已路人皆知。自从2003年与思科的一场知识产权诉讼之后,曾对美国市场孜孜以求的华为就一直不得其门而入。就在今年年初,华为手机与美国运营商AT&T的合作,也在美国议员的压力下临时泡汤。此后,华为也接连失去了在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等国电信运营商的招标资格;而这背后,同样有着明显的美国施压的因素。那么,为什么美国政界对于华为如此忌惮?在老冀看来,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美国正加紧对5G主导权以及对全球科技制高点的争夺。下面,老冀会从5G的社会意义、5G的产业链等方面,分析华为受压的前因后果。

为什么美国人对 5G 如此在意

5G 全称为第五代移动通信系统,作为 4G 的延伸,有更快的反应和能承载更大的传输流量,平均网速可达到 10Gbps 左右,是 4G 网络的 100 倍以上。如果我们仅仅从网速和流量的角度去了解 5G,显然会低估了 5G 的影响力。实际上,5G 绝不仅仅只是一种移动通信系统,它还将成为改变社会的通用技术。为什么这么说?让我们先看一下美国政界是如何理解 5G 的。就在 11 月 25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总统备忘录,指示商务部与下属的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制定长期频谱战略,以确保“美国必须首先使用 5G 无线技术”。而美国副首席技术官 Michael Kratsios 更是直言不讳地表示,要确保美国在 5G 的领导地位。在这份总统备忘录中,还指出

了越来越多的频谱使用领域,包括自动驾驶汽车、物联网(IoT)、商业空间运营和“精准农业”,这也道出了 5G 对于整个社会影响的广泛性。实际上,国际电信标准组织在定义 5G 标准的时候,不再只是像过去 3G/4G 标准那样定义了网速,更是提出了 5G 的三大应用场景,分别是:

1.eMBB(enhanced Mobile Broadband,增强移动宽带场景),也就是大流量移动宽带场景,适用于 3D 高清视频、AR/VR 等,这也是普通消费者理解的 5G 应用。

2.mMTC(massive Machine Type Communications,大规模物联网场景),这其实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应用场景,例如智能家居、智能企业、智能城市等。

3.URLLC(Ultra-Reliable and Low Latency Communications,高可靠低时延场景),它同样会打开一个巨大的市场,例如无人驾驶、工业自动化等。

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4G 改变生活,5G 改变社会”,5G 的普及将拉动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全面移动化和数字化,从而在全球的科技竞争中占据领先地位。当然,5G 对于社会的全方位渗透,同样也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咨询公司 IHS 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到 2035 年,全球 5G 价值链将创造 3.5 万亿美元产出,相当于 2016 年全球财富 500 强企业中前 13 强企业的营收总和。也正是因为看到了 5G 巨大的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特朗普政府才会一改共和党一向不干预企业决策的惯常做法,而是积极敦促美国几大运营商尽快推出 5G 商用,甚至还提出过由美国政府出资建立全国性 5G 网络的“不靠谱”建议,就是为了在 5G 上领先一步,进一步巩固美国在全球科技产业的领导地位。实际上,美国政界和产业界已经得到了不少经验和教训。2000 年之后,欧

洲由于率先商用 3G 而获得了主导权,而美国却由于标准之争落了下风。到了 2009 年,美国运营商抢先部署 4G 商用,不仅拉动了国内产业链的发展,也重新夺回了领先地位。

5G 标准博弈

既然抢得 5G 先机是如此的重要,那么,全球 5G 的进展又是如何呢? 5G 早期的主要焦点还是在于标准之争,而 5G 标准的制定,则主要由 3GPP 这个国际标准化组织负责。根据 3GPP 的规划,5G 标准分为 NSA(非独立组网)和 SA(独立组网)两种。其中,非独立组网方式需要使用 4G 基站和 4G 核心网,以 4G 作为控制面的锚点,满足激进运营商利用现有 LTE 网络资源,实现快速部署 5G 的需求。2017 年 12 月,3GPP 5G 非独立组网标准正式完成并发布;2018 年 6 月,3GPP 5G 独立组网标准也宣告完成,这也标志着首个真正完整意义的国际 5G 标准正式出炉,5G 进入了正式商用的阶段。

其实,早在 5G 标准的制订过程中,中美就已经展开了激烈的博弈。2016 年 11 月 14 日至 18 日期间,3GPP RAN1 #87 会议在美国 Reno 召开,本次会议的一项主要内容是决定 5G eMBB(增强移动宽带场景)短码块的信道编码方案,其中包括美国支持的 LDPC 码、中国支持的 Polar 码、欧洲支持的 Turbo 码。这已经是 5G 信道编码标准的第二次较量了。此前,在 2016 年 10 月 14 日葡萄牙里斯本举行的会议上,LDPC 码战胜了 Turbo 码和 Polar 码,被采纳为 5G eMBB 场景的数据信道的长码块编码方案。

在这个背景下,这一次关于短码块编码方案的争论更为激烈。由于技术方案较为陈旧,主要是欧洲阵营支持的 Turbo 码很快就被抛弃,而转变为中美之争。在这次会议中,中美公司都在不遗余力地推广自己主导的方案,并且拉拢那些中立的投票方。最后经过表决,LDPC 码被采纳为 5G eMBB 场景的数据信道的短码块编码方案,Polar 码则被选为 5G eMBB 场景的控制信道的短码块编码方案。虽然中国重点支持的 Polar 码最终也只是“四进一”,但是仍然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因为编码方案已经涉及到了算法,是最核心、最底层的标准了。

在 2G 时代,虽然美国高通公司主导的 CDMA (IS-95)并没有成为主流,却仍然凭借 Viterbi 算法让业界相信 CDMA 代表了无线通信技术的发展方向。因此,到了 3G 时代,WCDMA、CDMA 2000 和 TD-SCDMA 三种 3G 标准不约而同地全部采用了 CDMA 技术,从而让高通掌握了主导权。即使是到了 4G LTE 时代,虽然中国公司已经大量参与了 4G 标准的制订工作,但是由于核心长码编码 Turbo 码和短码咬尾卷积码都不是由中国公司主导,仍然无法取得 4G 发展的主导权。

这次 Polar 码在 5G 编码方案中的阶段性胜利,其实也标志着 5G 技术标准主导权的争夺,已经由过去的中美欧“三国演义”,变成了如今的中美“两强并立”。证券研究机构杰富瑞曾经发布了一份《电信服务——5G 和 IoT(物联网)的地缘政治》的报告,据该报告统计,在截至 2017 年年初的 1450 项 5G 网络重要专利中,有 10%为中国人持有,而且预计这个比例还会继续上升。

5G 商用之争

前面老冀谈到了中美对于 5G 技术标准的争夺。其实,要真正取得 5G 的主导权,除了技术标准之外,获得足够大的商用规模同样也非常重要——只有在 5G 商用中获得了较高的市场份额,才能让自己主张的技术标准转化为主导性的标准,并掌握 5G 未来的发展方向。举两个以前 3G 的例子。第一个是正面的例子。在 3G 阶段,正是由于中国政府率先批准中国移动商用 TD-SCDMA,才使得中国支持的 TDD 标准获得了一定的话语权,并在随后的 4G 标准之争中引入了同样是 TDD 制式的 TD LTE。

第二个则是反面的例子。在 3GPP 早就已经确定了三种 3G 技术标准(WCDMA、TD-SCDMA、CDMA)之后,由于美国阵营的坚持,仍然在此后将 WIMAX 确定为第四种 3G 技术标准。可是,由于全球主流运营商对于 WIMAX 均缺乏兴趣,只有韩国、马来西亚、中国台湾的一些非主流运营商将 WIMAX 投入商用,最终 WIMAX 仍然还是以失败告终。

这其实也是美国政府敦促本国电信运营商加快

5G 商用的根本原因。其实,在尝到了抢跑 4G 的甜头之后,美国四大电信运营商对于 5G 商用也确实都是争先恐后的态度。今年 10 月,美国运营商 Verizon 在洛杉矶、休斯顿等四座城市推出 5G Home 服务,利用 5G 为用户提供家庭宽带服务,Verizon 称这是“世界上第一个 5G 商用服务”。不过,Verizon 的 5G Home 是运行在毫米波频段并基于 Verizon 在 2015 年创建的 5GTF(5G Technology Forum)专有标准上,并不符合 3GPP 标准。Verizon 表示,将会在 2019 年早期推出符合 3GPP 标准的 5G 移动服务并且实现快速扩张。其他美国运营商也没闲着。AT&T 表示,计划在 2018 年内在美国 12 个城市提供 5G 移动服务并在 2019 年早期扩展到 19 个城市;Sprint 则透露,将会在 2019 年上半年在 9 个市场提供 5G 移动服务;T-Mobile 更是宣称,将在 2018 年内在美国 100 个城市部署 5G 商用网络。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在过去 4G 网络常用的中低频段(sub-6)部署 5G 网络之外,美国运营商还与高通等技术公司合作,成功地实现了在毫米波(mmWave)频段的 5G 网络试验。前不久老冀在参加高通举办的骁龙技术峰会上,已经看到了 AT&T 和 Verizon 在毫米波频段的成果。

可以预见的是,2019 年美国四大运营商的 5G 商用规模将获得较快的发展,美国也很有可能成为第一个普及 5G 的大国。相反,由于频段资源的矛盾和资金匮乏等方面的问题,欧洲运营商对于 5G 的部署普遍要慢一些,除了英国运营商 EE 有望在 2019 年实现 5G 规模商用之外,欧洲大陆大部分国家的 5G 规模商用恐怕要等到 2020 年以后了。

从目前来看,5G 大规模商用,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还是中国。2018 年 12 月 10 日,工信部已经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三大运营商发放了 5G 系统中低频段(sub-6)试验频率使用许可。以中国移动为例,中国移动早就已经完成了 5G 的基础技术开发,并从 2017 年开始在室外实施验证实验,2018 年将在部分地区推进商用化,2019 年开始将把中国的 100 多万处 4G 基站更新为 5G 基站,预计 2020 年在全国开展服务。在目前情况下,不排除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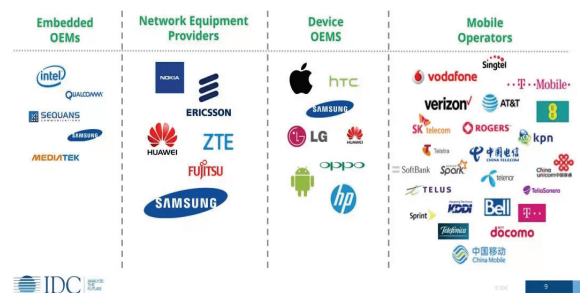
信部在 2019 年上半年就发放 5G 牌照以拉动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因此,完成覆盖全国的 5G 网络的建设,中国不会比美国晚多少。

前不久,全球移动通信协会发布了一份移动趋势报告。该报告预测到 2025 年,全球 5G 用户数将达到 13.6 亿,其中中国 5G 用户总量为 4.54 亿,美国 5G 用户总数则为 1.89 亿。此外,作为全球最大的手机大国,中国在第三方支付、手机游戏等智能手机相关服务上已经走在了世界最前端。5G 商用越早越广,就越能够有效地验证 5G 技术是否可行,越能够提早制造和部署符合 5G 国际统一标准的设备,进而推广到全球。

“中部塌陷”的美国 5G

由此可见,5G 主导权的竞争将更多地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展开,而且这种竞争并不仅仅限于技术标准,而是 5G 全产业链的竞争。那么,美国和中国,谁在 5G 全产业链上占据优势?再给大家看一张关于 5G 产业链的图:

Traditional Competitive Landscape for 5G



老冀认为, IDC 的这张产业链图还不够完整,在移动运营商的下游,其实还应该包括 Google、Facebook、腾讯、阿里巴巴等互联网公司;正是它们的努力,才将 5G 从技术标准变成了“改变社会”的强大驱动力。如果加上互联网公司,我们就会发现,美国企业在 5G 全产业链中有一定的优势:在最上游的“Embedded OEMs”领域,美国的高通、英特尔等公司占据较大优势;在最下游的互联网公司中,美国的 Google、Facebook 独步天下;在电信运营商领域,美国公司 AT&T 和 Verizon 仍然是全球最大也最成功的公司。可是,如果再看 5G 产业链中间的 2 个领

域,美国公司就没有多大的优势了:在网络设备提供商领域,竟然没有一家美国公司,华为是老大;在移动设备领域,美国的苹果公司也正在被华为超越。

是的,来自中国的华为正在获得 5G 产业链中间环节的主导权。先看技术。华为研发的 F-OFDM 已经成为全球统一的 5G 的混合新波形技术标准,华为提出的 Polar Code(极化码)也成为了 5G 控制信道的编码方案。据统计,华为持有 61 项 5G 标准专利,全球占比 22.9%,排名第一。再看系统设备。5G 设备包括基站设备和光通讯设备,华为是全球第一大设备供应商,基站设备全球市场占有率约 30%-35%、光通讯设备全球市场占有率约 40%-45%,都是绝对的第一。最后看终端。根据 IDC 的统计,今年第二季度开始,华为智能手机的出货量就已经超过 iPhone,排名全球第二。华为有望在 2019 年推出 5G 手机,也是最早量产 5G 手机的厂商。反观苹果,受与高通的诉讼所累,预计苹果很难在 2019 年推出 5G 版的 iPhone。由于在 5G 产业链上出现了“中部塌陷”,美国争夺全球 5G 主导权的努力将会受到极大的阻碍。实际上,产业界早就已经看清楚了这个现实。今年 4 月,美国无线通信和互联网协会(CTIA)发布的《Race to 5G》报告称,中国 5G 居于领先地位。

今年 11 月 23 日的全球移动宽带论坛上,英国电信公司首席网络架构师 Neil McRae 甚至公开表示:现在只有一家真正的 5G 供应商,那就是华为,其他供应商需要努力赶上华为。由此可见,华为已经成为美国“5G 争先”乃至占据全球信息产业制高点的绊脚石。在中美两国开始 5G 商用的时刻,美国使出一些非常规手段对付华为,也就不意外了。

打击华为并不可取

通过加拿大政府拘押华为 CFO 孟晚舟,通过向其他西方国家政府施加压力,阻止这些国家的运营商采购华为的电信设备,美国政界的目的是减缓华为在全球 5G 市场攻城略地的脚步,进而掌控全球 5G 的主导权。不过,美国的目标恐怕很难实现,主要有几下四大原因:

1.这些年全球化的发展,早就已经让我们的世界

变成了地球村,以至于任何一件电子产品都会涉及到全球数十个国家和企业的分工合作。前不久,华为在深圳召开核心应用商大会,首次公布了所有核心供应商名单。在 92 家核心供应商当中,美国厂商最多,占到了 33 家,其中包括英特尔、赛灵思、美光、高通、甲骨文等美国知名高科技公司。对华为的打击固然会让华为很难受,但是也会极大地损害这些美国公司的利益,进而在美国国内激起强烈的反弹。

2.在 5G 技术领域,华为已经积累了足够高的壁垒,使得美国运营商和技术厂商也无法绕开华为单独行事。例如,业界普遍看好 5G 的 eMBB 也就是大流量移动宽带场景,它适用于 3D 高清视频、AR/VR 等具体场景,而 Polar 码已经被确定为 5G eMBB 控制信道的短码块编码方案。据统计,华为已经占到了 Polar 码将近一半的专利。任何企业只要应用 eMBB 场景,就必须取得华为的专利授权。再如,华为的无线基站产品已经做到了成本足够低,产品竞争力足够强,以至于英国电信虽然一直将华为剔除在核心网供应商的名单,却仍然不得不大量采购华为的无线基站。

3.多年坚持不懈在技术领域的高强度投入,让华为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自给自足的能力,并不惧怕外界的封锁。我们看到,华为专门成立了做基础性研究的 2012 实验室,并在很多关键领域取得了突破。此外,华为也一直通过海思半导体开发各种通用和专用芯片。如今,华为的智能手机已经大部分改用自己的麒麟芯片,华为研发的 AI 芯片也已经在自己的服务器等产品上大规模采用。

4.由于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核心利益,西方国家政府也并非铁板一块。在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表态将华为排除在 5G 招标之后,法国和德国政府却表示,不会禁止华为为本国提供 5G 设备。况且由于欧洲与美国在 5G 主导权上的竞争,即使只是出于平衡的目的,欧盟对于华为在欧洲的发展也将持欢迎的态度。在 5G 风口到来的今天,美国政界对华为发动打击,希望达到打击中国高科技产业的目的,这种做法既不可取,也不会成功。

(2018-12-15 腾讯深网)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一方步步紧逼,各种密谋,并拥有超国家的力量,力图将对方赶尽杀绝,斩草除根。一个高潮,就是华为 CFO 温哥华转机时,突然被加拿大警方逮捕。这还真不是小说。而是一份西方报纸的披露。在这篇题为《“五眼联盟”是如何炮制扼杀华为的行动的》的文章中,《悉尼先驱晨报》开始几段话就是这样说的:

今年 7 月,一个温热的晚上,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与世界上最强大的情报官员一起喝酒。来自“五眼联盟”的情报机构负责人,在加拿大沿海省份新斯科舍一个安全的度假地,度过一个休闲的夜晚。之前,他们在附近的渥太华进行了紧张的会谈。特鲁多当天在该省处理完公务后,特意出席了这次聚会,分享关于地缘政治威胁看法。他离开后,对话回到了在这次年度会议之前就已开始、并将在会后持续很久的讨论:这些情报机构应该将它们对中国的担忧公之于众吗?

7 月 17 日晚宴之后的几个月里,参与晚宴的那些国家——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新西兰和英国——发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阻止中国技术巨头华为公司为它们的下一代无线网络供应设备的行动。而这一对北京越来越强硬的姿态,近期因华为 CFO 孟晚舟在温哥华被捕而达到高潮。

这里要解释一下:什么是“五眼联盟”?这由五个英语国家在 1948 年建立,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清一色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简称“五眼联盟”,五国情报人员进行情报分享与联



合拦截敌国情报。如果澳大利亚报纸报道准确的话,这场针对华为的联合密谋,就是在加拿大酝酿,特鲁多也不能完全排除干系。

下一步就是行动了。根据这篇报道:这些情报官员回国后,虽没同意都公开谈论中国,但都决定采取行动。而“五眼联盟”的盟友,还包括日本、德国等国。随后,这些情报机构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罕见的公共谈话,禁止华为参与 5G 网络建设。8 月 19 日,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的特恩布尔给特朗普打电话,告诉他澳大利亚将禁止华为和中兴成为澳大利亚 5G 网络设备提供商。8 月 23 日,在打完电话 4 天后,澳大利亚以国家安全为由,正式发布了禁令。环顾全球,澳大利亚也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禁止华为中兴 5G 设备的国家,甚至还走在了美国前面。美国当时也只是建议,运营商不要使用华为中兴的设备。

对华为来说,这难以接受。在推特上,华为澳大利亚公司当时的一份简短声明这样说:我们被澳政府告知,华为和中兴已被禁止向澳大利亚提供 5G 技术。这对消费者来说是一个非常令人失望的结果。华为在 5G 领域是世界领先的,在澳洲已安全可靠

地提供无线技术近 15 年。言辞中,一种悲愤扑面而来。要知道,为了拓展澳洲市场,华为但是也下了血本。华为投资 2000 万澳元,在悉尼成立了澳大利亚国家培训和创新中心。每年,为 30 名澳大利亚大学生提供机会,去华为学习下一代技术。这一项目还得到了澳大利亚政府“新科伦坡计划”的联合赞助。在詹姆斯库克大学成立了澳大利亚首家 NB-IoT 实验室,引领物联网发展落地。华为还积极赞助堪培拉奇袭队,以及作为黄金海岸太阳队的技术合作伙伴,为体育事业做贡献。可以说,在澳大利亚,华为是一家遵纪守法的模范纳税企业,从来没发生过网络安全事故。也因为这种苦心经营,华为得到了澳大利亚合作方的积极评价。按照资料介绍,在澳大利亚 4G 市场,华为占据的市场份额有 55% 之多。

5G 即将到来,华为正可以大有作为。哪知道,就这样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华为生生被澳大利亚扫地出门。这是公然对中资说不。以至于中国外交部立刻表示“严重关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更说了这样一段话:澳方不应利用各种借口人为设置障碍、采取歧视性做法。我们敦促澳方摒弃意识形态偏见,为中国企业在澳运营提供公平竞争环境。

宣布禁令的第二天,在一场“宫廷政变”中,特恩布尔下台。但在“五眼联盟”的合谋下,对华为的封杀,仍在进行中。11 月 27 日,新西兰以“网络安全风险”为由,对华为下达了禁令。12 月 6 日,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局长戴维·维尼奥在他的首次公开讲话中就一个“新的威胁”发出警告: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发现,在对加拿大建设和维持繁荣经济、知识经济的能力至关重要的领域,出现了由国家发起的间谍活动的趋势。我谈论的是像人工智能、量子技术、5G、生物制药和清洁技术这样的领域,换句话说就是加拿大未来增长的基础。”

谁都不会怀疑,他谈论的是中国。用《悉尼先驱晨报》的话说,加拿大禁止华为和中兴,可能也就是几个星期后的事情了。要提一下的是,正是维尼奥主持了那次“五眼联盟”加拿大会晤。在维尼奥发

表那番讲话一天后,在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英国军情六处负责人亚历克斯·扬格发表演讲。他在母校这样警告:“变化中的国家威胁,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的对手越来越有创意地利用现代技术。”这是一次被认为“非常罕见”的演讲,针对的是谁,也不用多说。

当然,最咄咄逼人的其实还是美国。在中兴之前,华为可能是在美国遭遇最悲情的一个中国企业。2008 年,华为联合贝恩资本收购 3Com 公司,遭到美国 CFIUS 的棒打,原因是威胁美国“国家安全”。2010 年,华为竞标美国斯普林特公司移动电讯设备合同,也因美国议员提出的“国家安全”原因受阻。2011 年,华为收购美国三叶公司(3Leaf Systems)部分资产,金额只有 200 万美元,依然遭到所谓“国家安全”的阻拦,最终,华为不得不放弃并购。2012 年,美国国会发布调查报告,认为华为的设备可能被用于监听或破坏美国电信网络,从此,华为被美国彻底拒之门外。2016 年,AT&T 公布了一份潜在的 5G 供应商名单,其中也包括华为,而且华为的报价比竞争对手低了 70%,按照《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国安局局长罗杰斯,和时任联邦调查局(FBI)局长科米(就是被特朗普炒掉的那位),亲自找 AT&T 高管谈话进行施压。当年,在美国工作期间,牛弹琴(bull-piano)就多次聆听美国有关华为的国会听证会,反正一边倒的是美国人对华为各种可能窃密的担忧,因此鼓吹美国必须限制华为进入。

今年 1 月,在发布旗舰手机 Mate10 Pro 前夕,华为本来要和美国电信运营商 AT&T 签约销售华为手机,但 AT&T 最后突然反悔。原因也简单,18 名美国国会议员曾联名致信联邦通信委员会,以所谓华为涉嫌在美从事间谍活动等为由,要求调查华为与 AT&T 合作。在当时的社交媒体上,华为终端董事长余承东的几句讲话,透露出前所未有的郁闷和愤懑。他是这样说的:我们过去很多年,在美国的所有收购,都被美国政府 CFIUS 给否决了,这对我们造成很大损失,你给别人的定金都付了,也给你否决了!本来明天下午大会主题演讲,我正式宣布旗

舰手机 Mate10 Pro 进入美国大运营商的前夕,突然被取消,造成我们巨大的经济损失! 中国对美国那么开放,而我们在美国却被害成这样! 请注意,余承东第二条留言中的哭脸表情。请注意,余承东第二条留言中的哭脸表情。

但余承东不知道的是,这种打击,还只是序幕。今年 4 月,美国司法部就华为是否违反了与伊朗相关的制裁令对其展开调查。而在这之前,美国商务部、财政部下属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则就制裁相关问题向华为发出了行政传票。《纽约时报》曾这样报道,美方当时并未指控华为有任何错误行为,行政传唤也不意味着刑事调查,但关键下面这个“但是”——“如果调查发现华为对上述几国的出口违反了美国的政策,触及美国国家安全,美国有可能限制华为获得关键的美制零部件和其他技术产品的途径。”但从最后的实践,这不是禁止零部件的问题,而是直接抓人。

当然,这背后,还是美国的焦虑。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一份遭泄露的美国情报就承认,从今年年初,美国就开始对华为公司深感担忧。这份明显由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一名高级官员撰写的备忘录说:“我们正在失利。谁在 5G 技术和市场份额方面领先,谁就拥有巨大的优势……占领信息领域制高点。”11 个月以来,这些担忧已经发展为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公开冲突。美国官员以安全担忧为由,推动盟国禁止华为参与建设它们的 5G 网络。

这份备忘录说,5G 绝非只是“更快的 4G”,它将使网速更快、网络和设备之间的延时更短、数据传输的容量更大。预计这些功能将支撑自动驾驶汽车、人工智能、机器与机器之间的通信,从而改变包括家居、医院、工厂在内的一切事物的运行方式。斗争还在进行中,这与贸易战可能有关,也可能无关。因为在贸易战之前,对华为中兴的忌惮,已经是西方一个公开的秘密。于是,以国家安全名义,采取各种手段进行打压,就成了不争的事实。斯诺登披露的信息还有,2007 年,美国国家安全局曾入侵华为总部服

务器。如果是中国国安部门入侵苹果服务器呢? 肯定又是一场轩然大波。

文章已经很长,都是西方的公开材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最后,几点粗浅的看法。第一,一些朋友认为,华为在西方的案件,是法律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这就不值一驳了。市场经济,公平竞争。但公平环境都不存在,这还是法律问题吗? 也难怪,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卢沙野大使公开指责:孟晚舟被拘押事件,不是简单的司法案件,而是有预谋的政治行动,是美国动用国家权力对一家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政治追杀。

这更凸显了美国的霸道。中兴是有错不假,但美国一开始全面封杀,置其于死地,这就不是制裁那么简单了。跟伊朗有交易的西方企业也不少,美国国内法替代国际法就不说了,即使真犯规一般也都是罚钱了事,至少还没有一个知名企业高管因此被美国判刑,但美国偏偏跨国拘捕孟晚舟。这利用的是美国在高科技的优势以及在金融领域的霸权。在贸易战的同时,通过科技战实行斩首战术。通过美元国际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让其他国家都不得不屈从于美国的淫威。

第三,中国更要冷静应对。确实,华为中兴的崛起,让世界见识了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转变,这种强大引领能力,让意识形态不同的西方,也确实很难接受。但中国企业核心技术的缺乏,又给了这些国家杯葛的能力。所以,最高领导人就曾警告: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在别人的墙基上砌房子,再大再漂亮也可能经不起风雨,甚至会不堪一击。而核心技术受制于是我们最大的隐患。

最后这一点,必须警钟长鸣! 因为此前的中兴事件,朋友圈看到大量以前“中国芯”重大突破的视频,但为什么投入那么多,却在最关键时候就掉了链子呢? 我们的研发机制、人才机制,有没有问题,值不值得深刻反思。这真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也绝不仅仅只在高科技一个领域! 伟大的背后,真的都是苦难。

(2018-12-16 牛弹琴)

任正非：用中式思维去理解西方是盲目自信



今年9月29日，任正非在公共关系战略纲要汇报会上发表了讲话，主要谈到了企业发展与公共关系的处理，在这个时间点重读，仍有收获。对于华为如今在部分西方国家的遭遇，任正非指出“不被个别西方国家认同，不要埋怨，因为我们做得还不够好”，“美国不认同我们，我们就把5G做得更好，争取更多的西方客户”。

任正非指出，要解决在西方遇到的问题，首先要充分认识西方的价值观，站在他们的立场去理解他们，不能光靠中式思维去理解世界格局，不能低估全球权力格局的动态变化，不能盲目自信，要将外部环境的压力变成倒逼我们业务创新与管理改进的动力。借鉴世界和中国发展历史，只有不断解放思想、开放进取、自我变革，才能不断强大，公司走向封闭收敛是没有出路的。另外，任正非建议华为人去学习哲学、历史、社会学、心理学、国际法律秩序及权力分配学等学科的知识，他认为“文明发展的历史能帮我们找到解决世界问题的钥匙”，“从今天看昨天，更容易找到轨迹”。关于公共关系的建设，任正非也提出了几点见解。公共及政府事务部要全员参与，要从一个部门，走向一个场态；公共关系基本原则与边界要清晰化，一些敏感话题不要介入。以下为讲话全文：

一、我们要解决在西方遇到的问题，首先要充分认识西方的价值观，站在他们的立场去理解他们

公共关系纲要主要是要解决与西方的沟通问题。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很容易接受我们的观点，日韩也还

好一点，欧美很难。如果我们和西方价值观不一样，怎么进得去西方？那他们就会认为我们是在进攻。他们一定会把墙越筑越厚、越筑越高，我们的困难就越来越大。实事求是讲他们几千年形成的文明，不是我们小小的公司改造得了的，蚍蜉撼树谈何易。我们这些年，都是采取中国的思维方式去理解世界的格局、去揣测西方的意图。要对世界有充分了解，必须站在西方的观念上理解西方。电视片《大国崛起》讲了一些道理，我们研究各国强盛的原因，要站在西方角度，去解释文明的兴衰。

几百年前，英国人把世界各地很多艺术品、杜鹃花运回国，站在我们的角度，这是掠夺。但如果站在英国人角度上，他们不这样认为。他们不惜漂洋过海，冒着生死风浪，把一些艺术品甚至整个神庙，用木船运到英国，好好保存下来。例如，津巴布韦维多利亚大瀑布，是戴维·利文斯敦发现的，他把它献给英国女王，并坚守在那儿几十年，防止有人开发破坏，想想那是百年前的蛮荒时代呀，要忍受多少痛苦，至少没有婚姻的幸福小康；把稀世珍宝的宝石献给女王，如果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行为，永远没有共同语言，也就不可能间接找到解决问题的模式。

中国改革开放，邓小平挖了一块洼地，低税制让外资进来，最后外国人相信了，然后忽地涌进来。看看现在中国社会的进步，谁会相信，三四十年前，我们还是濒于饥饿，经济几乎崩溃的状态呢？美国今天也在挖一个洼地，减轻产业负担，土地肥沃了，有可能是美国百年振兴的根基。如果下一任总统不改变现在的税收政策，而是到处去沟通友好，与谁都握手，就把投资吸引过去，加上人工智能的应用，怎么会不崛起呢？我们的公共关系工作现在应该不需要再去强调身份证明，能证明的差不多也都证明了。现在是要解决商业大环境的问题，就是要充分认识西方价值观，把华为价值观中和西方一致的部分讲清楚，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共识。

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价值观,我们并不完全接受西方的政治价值观,在市场经济、技术、用人方面,哪些是不能碰的,我们不接触就行了。我们坚持自己的自信,并不一定要示人。

二、学点哲学、历史、社会学、心理学、国际法律秩序及权力分配学,从中找到解决世界问题的钥匙

公共关系纲要中,哲学、历史、社会学和心理学等都需要放进来,这些人类文明的结晶,会带着我们找到解决世界问题的钥匙。在两千多年前西方出现的苏格拉底、柏拉图时代,中国也有孔、孟之道,但中国没有出过柏拉图。大家也假设过,如果出了一个“柏拉图”中国又会怎么样呢?为什么呢?孔孟之道提倡“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向内收敛的;而西方哲学主张往外开放,开放了两千年,西方就称霸了世界。中华文明收敛的五千年中,国家没有分裂,是不是全因为孔孟之道儒家文化呢?中国的西面、南面是高山,北面是沙漠,东面是大海,因此形成了一个小的封闭环境,这样的地理环境与思想形成可能有很大关系。你们想想,毕达哥拉斯原理,欧几里德几何是研究勾股定理中的原理、意义和探索他们的研究是为什么,是朝向源头,是道的问题;我们的九章算术也是在研究勾股定理,是研究怎么用,怎么解决问题,是向内核发展,是术的问题。我们向下,西方向上,那么就成了一个价值的分水岭,我们就没发现微积分,没有微积分就没有工业的基础。所以西方工业比我们发达。

一千多年前的欧洲还处于中世纪黑暗,GDP 每年增长不到 1%,公元始的一千年内经济翻了一番。中国一千多年前的唐宋文明已经非常发达,清明上河图不是凭空创造出来的。那为什么后来中国衰落欧洲就崛起了?莎士比亚怎么会对欧洲文艺复兴产生这么大作用?我以前想不明白。我看拜伦的《唐璜》,怎么这个戏剧就触及欧洲的思想解放呢?我看不懂,就问别人,别人说唐璜就是一个流氓,但冲开了宗教的禁锢;还有米开朗基罗的雕塑,我也不明白,怎么这就是文艺复兴呢?实际上,人本质上就是裸体的,厚厚的衣服穿上的封建和宗教。文艺复兴,就是恢复到原始自然的本来面目,这就是解放思想。莎士比亚的戏剧、米开朗基罗的雕塑开启了文艺复兴,也就开启了欧洲的强盛之路。

三百多年前俄罗斯彼得大帝派遣使团前往西欧学习先进技术,自己化名彼得·米哈伊洛夫下士随团出访,去做木工。修船造船,回国后就兴办工厂,发展科研,改革军事。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期间,大量引进了西方的哲学、艺术、绘画等。俄罗斯绘画是写实的,写实和工业化是有关系的。中国绘画是写意的,写意可能和今天的人工智能、虚拟游戏有关系,但问题是,没有造就中国三百年前的强大。

一百多年前,美国马汉提出的海权论,推进了美国海军的彻底转型,使美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海洋国家。而我们从汉武帝开始,就一直在征西,为了一个汗血宝马。汗血宝马的传代是靠母马。一个一个地生,不是靠公马播种,因此,两千年都没有形成强大的马队。我们忽略了海洋。当然,两千多年来为了守住边疆,我们的祖先牺牲了多少人。那时候去新疆戍边,带来的后果是永生永世不能再见妻儿,即使放探亲假,你也回不来,士兵靠步行走过沙漠的可能性能有多大?而且未必能马革裹尸还。我们看到前人的艰辛与伟大,也看到了我们的短视与不足。当我们不面向海洋,全球化就晚了几百年。我们到当代才重视海洋。

文明发展的历史能帮我们找到解决世界问题的钥匙。我们从今天看昨天,容易找到轨迹,而当事人就迷,想不清楚。比如人种的繁殖和传播,据说智人起源于非洲,一百万年前走出非洲,迁移到欧亚大陆跨大洋大洲,一定有人是划独木舟漂洋过海,想想海浪多大,有多少人葬身海底呀!可能一万条独木舟都不能有一条抵达。我曾经乘过十七万吨的游轮过赤道,恰遇风浪,我只能一直平躺在床上,思绪万千,朦胧中充满对先人无限的崇敬。所以,你们要加强哲学、历史、社会学的学习。你们可以不用看原著,看完也不一定抓得住重点,不如去看纪实片、讲座之类的视频,虽然不代表原著,但是学者把他自己的理解告诉你了,你多看几个学者,就明白了。也可以多看看西方有代表性的节目、演讲、辩论等,洞察西方最新的思想发展、思辨要点和社会心理变迁。再者,对同一个事件,中、西方媒体报道的方向、观点及引用事实与数据都可能是不同的,只有经常学习西方文章,我们才能理解这种差异,拉近东、西方思维上的距离,把信息沟通好,把问题处理好。

公共关系每年也可以招聘一些在西方留学的政治

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的博士、硕士,就像财经体系一样,放到非洲等艰苦地区进行锤炼。两三年后就开始循环,十年以后,队伍的长期迭代就基本解决了。

三、基础研究突破正在结构性深化,我们还没有被产业认同,是因为我们做得还不够好

华为过去 30 年的发展,不仅得益于中国开放改革的环境,也受益于全球化的产业环境。90 年代之前,全球电子工业是以日本为中心,70、80 年代日本电子产品风靡全世界,但它用的是模拟电路,当时运算放大器的生产很难,成品率很低,成本高。90 年代美国数字技术兴起,开启新一轮电子工业革命,全球化电子工业开始起飞。中国开放改革,恰好跟上了这个时代,但俄罗斯进行的不是电子工业革命,而是政治革命,错过了这个产业周期,就被边缘化出去了。我们这只小麻雀正好出窝,一步步跟随,刚好每一步都踩在鼓点上,直到今天我们才刚刚走到了起跑线。

正是因为我们的出身不好(民营企业),才使得我们更加努力,我们才会更加有希望。我们不被个别西方国家认同,不要埋怨,因为我们做得还不够好。有人说“百年基础研究的红利基本消耗完了,现在是存量竞争”,我不认同。这个时代,正从管道转向平台化;平台逐步云化;私有云、公有云逐步成为一个全球化大云;云开始逐步的智能,到万物智能,这中间需要多少的理论突破呀!基础研究突破所带来的红利并没有消耗完,而是正处于结构性深化之中。即使改造存量,也不是用鲁班师傅的方法。亚马逊模式对世界的颠覆太厉害了,他们在科技汇聚上的能力是很强的。再比如 NASA 的改革,马斯克发射了一个重载火箭这么大推力的火箭,这些都不是我们能比拟的。所以,我们要宽容探索创新的科学家。

存量改造永远是最重大的机会,但只有突破了才有改造存量的可能性。中国的高铁、轮船为什么做得好?所谓核心技术都在别人手里面,但我们不停地造造造,外国就造不出来了,因为我们的核心技术是总体集成,总体集成本身也是核心能力。高铁与普铁是有根本区别的,普铁速度慢,是轨道基座建在土地上的,用道渣来调平;高铁的轨道基座是建在岩石上的,桩打下去几十米,容不得半点波动。高铁工业的发展模式,就是走合作共赢的道路,任何一个技术只有一个国家掌握,这个

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造大轮船,主要靠焊工。华尔街有几个人愿意脱了西服做焊工?钢板焊工、钳工是中国造船的基本力量。现在是我们的小镇美女上飞机小镇男儿去做焊工,我们有足够的男儿,经过训练我们就有做大轮船的集成力量,这也是核心能力呀!各有所长,互补互助。

我们重新构想一下,其实我们这么多年都是跟随战术,最近我和研发讲话,就是要研发站起来,在战略机会点上要领先。我们对客户需求的理解不能狭窄,不要以为客户说出来的是需求,其实客户需求是一种逻辑学和哲学,是人性的持续激活与成长,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客户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客户需求,面向未来的科技创新也是客户需求,只是更长远一点。过去公司的人才结构是“金字塔”,将来应该呈“倒三角”,我们把确定的工作实现智能化和自动化,下面三角形变小,我们腾出这个口来,从世界前沿招聘更多的博士、硕士,更高端的科学家、专家进入我们公司。我们为什么给 Polar 码之父颁奖?就是要让全世界看到华为对科学家很尊重,愿意和我们合作。美国不认同我们,我们就把 5G 做得更好,争取更多的西方客户。

四、未来公共关系的价值观与战略纲领是“合作共赢”,要建立一个开放的思想架构

你们是一把伞,可能与业务部门有冲突,各说各的调,唱唱双簧,他们做他们的“矛”,也没有什么不好,没有必要步调一致。合作共赢是公司的大思想,实现过程是困难的,要允许部门不听话,慢慢会转过来的,这就是华为。

第一,公共关系要把华为的价值观讲清楚,大帽子一定是合作共赢,要以高屋建瓴的方式建立世界的平衡和合作共赢的格局。如果没有这个纲领,那就容易被理解为要颠覆世界世界就会排斥我们。领先者,可以只顾自己;领导者,就要顾及他人。这么多年来我们都想领导行业,但我们还做不了领导者。那我们就要实现战略领先,利他和合作共赢,与西方的价值诉求是一致的,公共关系一定要强调和平共处。

公共关系要建立一个领导世界的模型,营造领导者的环境,和技术、市场口可以走不同的价值观道路。公共关系走的是合作共赢、领袖姿态的道路;技术和市场口要领先,走的是竞争道路,走的也许是不同的道

中国与世界的软实力沉浮录

将近 30 年前,美国政治科学家、前克林顿政府官员约瑟夫·奈在《外交政策》上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他称之为“软实力”。这个名称迅速走红,进而定义了冷战后的时代。奈的主张是,尽管美国的实力比二战结束后似乎弱化了一点,但这个国家依然有一种独特的力量。奈后来解释到,除了动用军事力量“实现目的、控制对方,让对方如我所愿行事”,美国还可以诉诸于它的软实力——也就是非强迫性的力量——来巩固其世界的领导地位。

硬实力当然很容易衡量,我们可以数一数导弹、坦克和军队的数量。但什么是美国的软实力?奈把它归结为三类: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在这些领

域,全世界都希望变得和美国一样,这种力量可以让美国改变整个世界。“如果一个国家在其它国家看来是一个合法的存在,它做事情就不大会遭遇阻力,”奈认为,“如果它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有吸引力,其它人就会心甘情愿地追随。”在奈看来,美国软实力的基础是自由民主政治、自由的市场经济和一些基本价值观,比如人权。总之,就是自由主义。

在奈提出软实力概念后的四分之一世纪,全球事务基本上围绕着他的理论发展。美国赢得冷战之后,美国自由主义在全世界有至高无上的吸引力。所有人都想要投票,所有人都想穿牛仔裤,所有人都想要言论自由,以至于政治理论家弗朗西斯·福山

路,慢慢协调,公共关系是多帮助,不是多指责。如果是走相同的道路,正反馈容易让公司走向极端。公共关系对公司应该是负反馈,要约束公司的一些极端行为。公司左的时候,你们应该右;公司右的时候,你们就左。这样才能避免走偏。公共关系要做华为价值观传播使者,我们现在的重点任务之一就是怎样从所在国当地的本土文化出发、用本地语言来讲华为的故事、本地贡献等。日本企业进入德国时,在波恩、杜塞尔多夫等城市种了很多樱花树,受到欢迎,几十年过去了,都成了当地著名景点。

第二,公共关系以前主要是对外的一块盾牌,以后不仅是对外的盾牌,也是对内思想转变的催化剂,对内、对外都要开放。学学打打太极拳,少一点少林寺,别咄咄逼人,可以自黑,不可以自夸。我看过《远方的家》,一个师傅轻轻柔柔的太极舞动,脚下的沙土陷下去一对浅坑,可见内功之大。华为员工要多练内功,内功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抗住外部压力要靠内功。公共关系与心声社区多推动大家学习,思想的修炼不

是一天能完成的。现在社会过分夸大了华为,这是有害的,别让我们的年轻人,以为公司真的成功了,而麻痹起来。

当前我们还缺乏对西方世界(权力结构、文化与冲突、价值观、社会心理等)的深刻理解和认识。在西方占据强势话语权和世界主流价值观地位的现实下,我们只有站在西方的立场上理解西方价值观,基于西方的思维方式进行对话,才能有效沟通,才有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公司不能低估全球权力格局的动态变化,不能盲目自信,就像 100 多年前义和团那样。要将外部环境的压力变成倒逼我们业务创新与管理改进的动力。借鉴世界和中国发展历史,只有不断解放思想、开放进取、自我变革,才能不断强大,公司走向封闭收敛是没有出路的。外部环境虽然逐步变坏,但未来世界数字化、智能化和云化的空间很大,我们只要在技术上创新求真,踏踏实实地干出尖端成果,组织有活力,员工有干劲,公司还有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与能力的,这点要充满信心。(2018-12-13 虎嗅网)

用“历史的终结”来表达全世界都在奔向一个西方已经到达的政治终点线的状态。

从 80 年代到 21 世纪的几十年间,自由民主政体从 100 个增长到 150 个。根据《华尔街日报》和传统基金会发布的排名,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体从 40 个增长到 100 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那么多国家放弃那么多传统的政治经济体制,转投一个新的怀抱。奈称其为软实力,我称其为伟大的皈依。在奈毕生致力的国际关系领域,美国领导建立、扩大了一系列支持新的世界秩序的国际组织,包括国际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还扩大了自己的盟友团队,把以往的对手吸纳进来。

欧洲也在发生同样的事情,欧盟扮演了与美国相似的角色。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全世界吃惊地看到数十个国家主动放弃他们自己的主权,转而接纳一套基于自由价值观的生活准则。布鲁塞尔的倡议与奈的见解完全吻合,所有成员国和潜在成员国都想要西欧人手里的东西。实际上,似乎每个人都想要西欧的那一套,甚至连奉行完全不同社会文化的穆斯林国家土耳其,和冒着与俄罗斯开战风险的乌克兰也不例外。直到最近,换句话说,看起来 21 世纪必将属于美国、西方和他们的软实力帝国。但事实并不是这样。

一些事情出了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产品并不适合客户。从 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第三次浪潮”民主运动,到东欧国家在冷战后一窝蜂地加入欧盟和北约,到近期那些经历过阿拉伯春天洗礼的国家,自由民主制度似乎不大靠得住了。而且在很多国家,它给人民带来了惨重的灾难。

有一个理论或许可以说明,作为软实力年代重要组成部分的新自由主义经济革命为什么削弱而不是提振了某些国家。市场永远不是一个整体,认为它是一个万能的机制,能带来增长、仁政和社会福祉的想法本来就是错误的。德国社会学家沃尔夫冈·施特雷克今年夏天在台湾的一次会议上阐述了这个观点。他提到,软实力全球化只不过“超过了国际社会和国际组织建立有效的经济政治机构的步伐”,因

此“债务、不平等和不稳定现象的增长”正在导致“一个普遍的政治经济危机”。这个危机让软实力国家内部也产生了反对的力量。施特雷克称之为“夺回控制权”。你或许可以说这就是美国的唐纳德·特朗普、匈牙利的维克托·欧尔班,甚至是意大利的五星运动和国际联盟出现的原因。截止到目前,这样的反对力量派生出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意大利、波兰和美国政府中反自由力量占据多数席位,这还只是在发达国家中。软实力自由主义悲哀的现状,使其在本来有机会发扬光大的国家里难以维系。

其次,美国以及欧洲对于他们的软实力寄予了过度的信心,以至于迫不及待地要让全世界都按他们的方式做事。正如安东尼·雷克——美国冷战后第一任总统比尔·克林顿的国家安全顾问——所说,美国未来的繁荣来自于“在海外推广民主”。这种包容性的政策应当取代冷战的遏制策略。之后,这种观点走向极端化,乔治·W·布什总统宣称美国是“一个道德的国家”,说“任何一个文化、时期和地区的道德真理都是相同的。”这简直是给软实力打了一针胆固醇。新加坡学者、前外交官马凯硕在他的新书《西方输了吗》中,说这一切都是西方的骄傲自大。的确,骄傲自大或许是描述现状唯一合适的词语了。人们对于软实力的力量和地位如此自信,以至于很多的硬实力行动都要打着软实力的旗号。伊拉克战争是最明显的例子,在欧洲支持下干涉利比亚是近期的实例。美国和欧洲在这两次战争中没有捞到任何好处。

第三,对于软实力的过分自信导致一种幻觉,似乎软实力可以独立地存在。但即使奈也没有这么说过。在现实中,软实力总是硬实力的延伸。假设美国变得穷困潦倒、虚弱不堪,就像世界上很多新兴民主国家那样,但是还在坚持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和制度,恐怕就不会有国家愿意追随它了。对于软实力可以独立发挥作用的误解,或许可以证明我们的一个致命错误信念——在萨达姆·侯赛因被推翻后,伊拉克自然而然会变成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所谓的欧洲计划更是如此,它也建立在对软实力的错误理解上。

几十年来,欧洲一直在搭乘软实力游戏的便车。美国保证它的安全,它的经济依赖于美国领导的全球经济秩序。当美国对两者都不那么感兴趣的时候——它已经转而诉诸硬实力——欧洲开始面临真正的挑战。

第四,软实力其实很脆弱,容易被推倒。在过去几十年里,软实力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推动下的确有势不可挡的趋势。无数个颜色革命推翻了政府、解体了国家。当脸书和谷歌把革命之火传播到开罗的塔利尔广场和基辅的独立广场上时,西方欢呼雀跃。但是当俄罗斯用同样的手段瓦解了西方政治时,他们就没那么高兴了。西方对于软实力的自信,来源于他们真诚地相信一个社会越开放越好。但是现在,媒体和立法机构中不断传出审查互联网内容的声音。互联网企业巨擘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压力,要求他们自查。包括脸书、YouTube 和苹果在内的很多公司已经开始这么做了。所以,自由主义软实力的一块重要的基石——言论自由——似乎已经失宠了。

现在,硬实力无处不在。美国毫无疑问是游戏中的最大玩家:对朝鲜的火与怒、对所有人发动的贸易战、掏空国际贸易组织、用国内法律惩罚与其它国家做生意的外国公司,等等不一而足。而欧洲更像一头聚光灯下温驯的鹿。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呼吁坚决反对特朗普,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当然还有俄罗斯。利用手中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的硬实力,俄罗斯获取了二战后最大的领土范围——从乌克兰手中夺取了克里米亚。与此同时,莫斯科在叙利亚所采取的行动改变了这个国家内战形势的走向。还有一些小规模硬实力。其中最著名的是朝鲜,它的领导人金正恩在被西方诽谤多年之后,今年夏天与特朗普会面。如果他的手中没有核武器,实现这个伟大成就是不可想象的。到目前为止,金的硬实力游戏进展得不错。很明显,软实力时代已经让位给硬实力时代,然而这是危险的。几个世纪以来,硬实力政治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仅在 20 世纪,硬实力就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个漫长的冷战,人类几乎被毁灭。是

时候让我们寻求更好的替代方案了,这就需要中国的介入。奈在最早的软实力文章中几乎没有提到中国,中国总是隐藏在苏联的阴影里,要么就是被认为不具备任何软实力和硬实力,无法对西方造成威胁。

三十年之后,奈的这个疏忽似乎不可原谅。在软实力的年代里,中国是唯一一个坚决抵制这个趋势的大国。它通过传播其深厚广袤的文化、与几乎所有国家结成紧密的经济纽带关系,让自己充分融入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中。它现在是世界上,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贸易国。但它始终坚定不移地拒绝成为西方软实力的客户。它在内部经历极为复杂的转型,从中央计划经济变成市场经济,但不允许市场凌驾于国家之上。它拒绝接受西方民主、自由和人权的理念,而且不断强化一党执政制度。在软实力领域,中国与西方的取向完全不同——无论是在文化、意识形态还是制度层面上。

结果如何呢?与大部分经历艰苦转型过程的国家完全相反,中国以人类史无前例的速度和规模取得了成功。这个国家把一潭充满贫困的死水,变成了以购买力平价指数衡量世界上最大的工业经济体。在这个过程中,有 7 亿人脱离贫困。哈佛大学的格拉汉姆·埃里森说这是“贫穷金字塔”的奇迹。四十年前,九成中国人生活在世界银行规定的“极度贫困线”以下。今年,金字塔被翻转过来,只有大约 10% 的中国生活在极度贫困线下。如果没有中国的贡献,全球人口的贫困比例在过去几十年里必然呈上升,而不是下降的趋势。

这样的成就或许是一种新的软实力。将近二十年前,中国伟大的战略家郑必坚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概念来表述中国自身的发展方向。多年来,和平崛起战略遭到了诸多怀疑。例如,批评人士指出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表明中国并不主张和平解决方案。埃里森曾经提出警告,不管他们的意愿怎样,美国和中国还是会落入修西得底斯陷阱,也就是一个新崛起的力量(中国)给既有占主导地位的力量(美国)造成的恐惧将会导致战争。埃里森在他的新书《注定战争》中指出,历史上 16 个新兴力量的崛起过

21 世纪国防新思维与中国对策

当今之国际政治,正处在一个和平制衡时期。但细究目前变幻莫测的世界风云,回首世界军史演变与大国兴衰,不难看出,在当今这样一个国际缓和的背景后面,正酝酿着一场深层的历史性的变革,与此相应,一场划时代的军事和国防战略的变革正在到来。

一、“星球大战”计划与国防新思维

今天核武器控制权的多元存在,导致核防卫和核进攻失去了威慑意义;核武器把火器的历史推向顶峰,同时又把它送入自我否定的深渊。就在这种核失落的同时,世界大国却把目光瞄向浩渺的太空;就在世人为“中导协议”以及由此为起点的美国与前

苏联大幅度裁军普遍欢呼的时候,美苏双方却都加快了太空争夺的步伐。美国从里根到布什,都不惜巨资支持那宏大的“星球大战”工程,原苏联也紧锣密鼓地实施他们的“宇宙开发计划”,这都意味着一个划时代的国防新思维将支配 21 世纪的大国国防战略的制定。

“星球大战”计划和“宇宙开发计划”一样,从表层分析,它想通过一张人造空间巨网封锁敌国绝大多数核导弹对本国的攻击,从而使敌国核武器失去威慑力。但从深层次分析,这两个计划都意味着一种新的战争形式即信息战的形式将借助太空而成为未来战争的主要内容。可以预见,未来战争,既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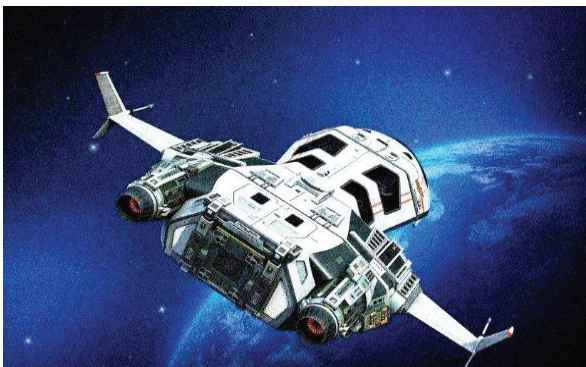
程中大部分都经历了血腥的战争。

但是,让我们后退一步,公平地说,中国的和平崛起已经发生了。它实实在在地已经存在了,证据是其庞大的经济体、贸易量,以及军事力量的提升。与历史上其它大国的崛起过程相比——雅典帝国、罗马帝国、大英帝国、美国的昭昭天命、现代德国、法国、日本,所有国家的崛起过程都伴随着惊天动地的暴力——中国的崛起过程到目前为止比所有这些国家的速度更快、规模更大,而且是和平的。没有对其它国家的入侵,没有殖民,没有战争。的确,埃里森对于修西得底斯陷阱心理描述或许是正确的。但是在实质上,世界已经渡过了需要担心战争和冲突的时间点。或许这就是中国正在从硬实力向软实力转移的原因,尽管其它国家似乎都在做相反的事情。例如,习近平主席曾经呼吁“命运共同体”,各个国家都可以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同时增进相互合作。在政策层面上,这种软实力主要通过“一带一路”倡议

彰显出来,中国利用自己庞大的资本和能力推动其它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当地的经济增长,从而最终使中国自己受益。这是一个新的潜在软实力方案:“你不需要和我们一样,你也不需要追求我们所追求的目标,你可以在保留自身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前提下参与一个新的全球化进程。”从很多方面来看,这与奈的模式完全不同,而且或许会招致诸多负面问题:欲速则不达、普世真理的幻觉、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反对。

在冷战后的年代,西方把软实力与自由主义接轨,但并没有必要这么做。在下一个世纪,我们最好斩断软实力与普天之下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至少北京并不认为任何软实力可以脱离硬实力而独立存在。但是中国的倡议更具包容性,它不强求其它国家遵循自己的模式,因此它的软实力意味着一个更加和平的 21 世纪。这个模式值得世界效仿。

(2018-10-24 外交政策)



是由火器威力支配的战争,更可能是一场由信息控制权所支配的战争;未来战争进攻的主要目标将不再是物资分布密集区,而是信息分布密集区:交战各国通过太空通信网络,用高技术造成大面积的信息干扰,破坏乃至改换对方包括电视画面在内的整个传播信号。如果被攻击国由于技术力量落后以致在短期内无法改变这种被动局面,那它无疑就会失去自控,从而失去战争主动权:海湾战争的全过程及其结局则是对这一预见的有力证明。显然,信息战是未来战争的主要内容。太空战略则是下一世纪世界大国的主要国防架构。这一切给人们提供的新思维应当是:谁控制了太空,谁就控制了信息,谁控制了信息,就将赢得未来的战争。如果说,以往的战争旨在摧毁一个的肢体,那么未来战争则旨在切断这个人的神经并继而摧毁他的大脑。海湾战争就是一场切断战败国“神经”却没有摧毁其“大脑”的战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的惨败,也不能仅仅归因于原子弹的力量,而日方电讯密码的频频泄密,恐怕是败因的关键。

二、中国国防正面临着世纪性的挑战

由于中国经济一直处在以自然农业为基础的阶段,从而地缘国防观念和以陆战为主的国防体系就自然成为中国国防的传统思想基点。然而,从历史上看,造成这种国防体系,除了经济的作用,还应归因于自然的造化。俯察中华版图,一个极有趣的事实是,除了北方外,中国周围都受到大自然很好的保护:在没有飞机的古代,西部与西南部的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就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如果没有这

道屏障,当年亚历山大以及后来的穆斯林大军,就很可能在我国西部或西南部留下足迹,也可能今天的中华文化版图就会改观。另一面,在中国东部和东南部,国土又受到东海和南海的天然保护。在没有航海,特别是远程航海技术条件的古代,征服大海远比征服中国更要困难,正如由于有大海作梗,忽必烈征服日本远比征服中原更为困难一样。因此,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发展象英国那样的海军,更没有,也无必要建设象英国那样的海权国防。鸦片战争前,中国就没有一支国防意义上的正规海军。可见,大海的天然保护给中国的国防史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这种天然保护使中国古代国防失去了海防的功能,从而也就没条件积累足以自卫的海战经验。鸦片战争是英国在海上对中国的胜利,这乃是大海留给近代中国国防的第一个苦果。最安全的地带也就是最脆弱的地带,中国古代国防的近代惨败应验了这个军事辩证法。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后顾之忧,中国国防便一直以抵御北方少数民族侵扰为目标,长城的出现便是这种国防思维的产物。北方少数民族的频繁南犯刺激了包括骑兵在内的中国陆军和地缘军事理论的发展:翻开武经七书,无不以地缘军事为母题。正因此,当西洋舰炮打到中国东大门时,中国军人竟不知用海战的方式,而是以“高筑墙、广积粮”的农业方式来与洋人作战。这样的国防又怎能逃脱失败的命运。鸦片战争的惨败迫使中国近代国防开始由地缘防务转向海权防务,甲午海战——尽管它失败了——就是中国海权国防的初试。

中国国防由陆地转向海洋,再由海洋转向太空,经历了十分艰难但又脆弱的历史:鸦片战争失败,导致中国开始尝试海权国防战略,这是洋务运动的目标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在初期交锋的失利,使中国意识到国防体系中制空权的重要性,这样便开始了在洋人陈纳德帮助下开始的中国空军组建。与此同时,延安红军也显露了未来中国空军事业的曙光。然而,由于当时中国政局动荡,使当时中国国防不可能有大作为。真正的和

正规的海权和空权国防事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事,其间,尽管中国经历了历史的折腾,但中国还是有了以核武器为后盾的正规海军和空军,初步奠定了陆海空三位一体的立体国防体系。

然而,正当中国国防开始大踏步地全速建设自己的海权和空权防务的时候,世界军事目标则开始转向太空,世界大国的国防投入也相应地转向以信息战为主要内容的太空国防战略。美国三军联合司令部拨出巨资大力发展能束武器,它包括:高能激光器(HEL);粒子束(PB);高功率微波(HPM);电磁脉冲(EMP)等,以及开展对电子战、通信指挥控制系统、微电子学、计算机、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军事研究,以调整传统的平面式的国防体系;原苏联前几年的军事演习已向世人表明,他们的军事高技术武器已达到相当的水平;而美国军事高技术在海湾战争中的出色表现,更是传统国防战略开始向现代形式转变的初试。无疑,这个世纪性转变一旦完成,那么,世界军史就要换上新日历。在这份日历上,军事攻击和国家防务的重心将不再是敌国的物资分布的密集区域,而首先是敌国的信息源和信息网络分布的密集区域。同样,火器(包括核武器)也不再是作战的第一手段,而利用电磁、激光等高技术干扰、破坏乃至用遥控的方式更换被攻击国信息网络所传送的信息内容,可能是下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军事内容。中断一国信息源和信息传播网络,就等于切断一个人的思维或传导神经一样,这远比对该国的物资破坏更有效。

中国国防正面临着这样一个世纪性的挑战。过去的边境自卫反击战,我国都还没有体验到这种挑战对本国国防的压力;然而,近几年发生的几次较大的国际冲突中建立的高科技基础上的信息战术已获巨大成功的事实,应引起我们的警觉。无疑,未来的军事较量将首先表现为信息技术的总体较量,对此,我们不能盲目乐观。21世纪的国防绝不会是人力竞赛,而是以信息技术为依据,以太空防务为主要目标的国防体系。对此,我们必须制定相应的对策。

三、迎接挑战的基本对策

中国国防事业应有一个高起步的变革,不然,我们还要重蹈近代覆辙。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即使我们的国防对手也极不愿让我们意识到的现实,这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极不愿意自己的对手意识到原子弹威力的事实一样。目前,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世界在国防教育中已开始注意对少年儿童以太空宇宙意识的培养,不管是儿童文艺还是游戏玩具,都在注意把少儿注意力和兴趣引向太空,这从国防意义上看,无疑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对此,我国的国防教育则不足,目前它还没有摆脱古典式的国防观念,因而它的国防教育还处在呼唤儿童对祖国山河热爱和对大海向往阶段,这种教育模式正是我国传统的地缘国防思维的产物,而在当今军事观念大转向的国际形势下,这无疑是一种战略性的失误。这个失误必须迅速纠正。为了21世纪,我国国防教育应加强对全体国民,特别是全体小国民——作为一项基础工程——的空间意识的培养:改变了儿童,就意味着改变了未来。与此相应,中国国防投入的重点也应转向对太空及其开发技术的研究。在21世纪,谁不了解太空战的意义,谁就会失去参与国防与国际事务的资格。

有人说,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中国的国防水平也不可能超过这个阶段。这是不对的。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国防,都是和时代最先进的科学及时同步前行,没有与时代同步发展的技术装备,国家防务就失去了实际意义。60年代,中国正处在最困难时期,但中国由于有了核武器,才使其国防产生了巨大的威慑防卫功能;70年代,苏联优先发展导弹军事技术,从而在国际事务中获得制衡美国的威力;在今天,中国的国防也只有优先选择跳跃式超前发展对策,积极参与当今的太空开发事业,建立起卓有胆识的太空国防战略,唯此,21世纪的中国强大才能得以保证。21世纪,正在向中国及其国防挑战,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迎接这场世纪性的挑战!

(2018-12-13 四月网)

41 年前，高考恢复

12月10日，日子似乎平凡无奇。但往前推41年，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报考总人数达到1160万人的考试，从今天开始——41年前的今天，高考恢复。

1966年“文革”后，新中国成立之初形成的统一高考制度被废除，无数有志青年从此无缘大学校园。1977年，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作出当年恢复高考的决定。10月12日，国务院正式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12月10日，北京高考开始，作文题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突然间，广大知识青年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不再操决于他人，不再由出身和关系来决定，而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通过公平竞争来决定。”今天，侠客岛推荐一篇由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教授，发表于《教育发展研究》2007年第8期的文章——《1977年高考：一次空前的招生考试》。文章4000字，但故事很多，侠客岛略有删减。看完，相信你会对高考有不一样的感触。

许多事物深埋在岁月中便成了尘土，有的却成了琥珀。1977年高考的恢复，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中国教育史的新纪元，是“文革”后拨乱反正开创新局的分水岭，是弃旧图新的标志。77年高考恢复，也被一些人看成是个人和民族的“诺曼底登陆”，是“中国青年的复活节”……确实，1977年的高考，不仅成为许多人命运的转折点，更是这个国家与时代的拐点。它是一段值得珍藏的历史，是一个永留史册的传奇。

突破坚冰的举措

1976年10月，“文革”结束，持续十年的混乱终结。社会要逐渐走向正轨，则必定要有一个合理的人才选拔机制。而恢复高考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但选在1977年恢复，则是必然中的偶然，与邓小平的英明决断密切相关。1977年8月4—8日，在人民大会堂江西厅，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召集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每会必到的邓小平在一旁安静地听，既不引导大家往哪方面谈，也不对别人的发言表态。8月6日下

午，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说，大学的学生来源参差不齐，没法上课，必须废除群众推荐、领导批准那一套，恢复高考招生，凭真才实学上大学。在会上，查全性还指出当时招生制度的四大弊端：埋没人才；卡了工农兵子弟；助长不正之风；严重影响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他建议，从今年开始就改进招生办法，“一定要当机立断，只争朝夕，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听完查全性的言论，邓小平没有表态，他环视四座问道：“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意见？”见在座的吴文俊、王大珩等科学家纷纷表示赞同，他又问当年恢复高考是否来得及。一些代表说来来得及，于是邓小平最后表态：“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今年就恢复高考。”

1977年，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果断决策——恢复高考。查全性的发言是引发邓小平表态的重要契机。据当时高教司司长刘道玉的回忆：会议已进行三天了，来自武汉大学的一位代表一直没有发言。我向他建议说：“代表们的确讲了很多意见，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没有讲，那就是由迟群一伙在北京两校推行的‘十六字’招生方针……因此，希望你明天就集中讲这个问题，明确提出推倒‘十六字’方针。所谓‘十六字’方针，就是‘文革’后期推荐工农兵到大学的基本原则：‘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刘道玉提到的那位‘来自武汉大学的一位代表’就是查全性。但查全性的回忆却与刘道玉不同，他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回忆到：发言之前，我没有和任何人商量，也没有任何人建议我怎么讲。我估计，虽然个人有点风险，但风险也不大。其实，我知道大家心里对这些事的看法基本是一样的。我讲的这些内容其实也并没有什么新奇，大家都是这么想。

参加此次会议的温元凯还有另一种说法：我就说高考制度要改革，并提出了十六个字的高考恢复方案。这十六个字叫做“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没想到邓小平听完我发言后讲，温元凯，至少采纳你四分之三。我们大家都一愣，什么叫四分之三。邓小



1977年高考现场

平说,第二句“领导批准”可以拿掉,考大学是每个人的权利,不需要领导批准。邓小平做了决定以后,我们所有的代表,包括人民大会堂端水的女孩子都情不自禁地站起来鼓掌,整整五分钟。其实,历史真相如何,还有待复原。但可以明确的是,一些专家提出恢复高考的建议,只是邓小平决意恢复高考的诱因。应该说,在科教工作座谈会之前,邓小平已经有意要恢复高考了。

1975年邓小平第一次复出时,就有重振教育的举措和想法。在1977年5月24日与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邓小平便说:“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自告奋勇”分管科技和教育,1977年7月29日,在听取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和教育部部长刘西尧汇报时,邓小平便说:最近准备开一个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的,与“四人帮”没有牵连的人参加。有几个问题要提出来考虑:第一,是否废除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第二,要坚持考试制度,重点学校一定要坚持不合格的要留级。对此要有明确的态度。第三,要搞个汇报提纲,提出方针、政策、措施。教育与科研两者关系很密切,要狠抓,要从教育抓起,要有具体措施,否则就是放空炮。

可见1977年8月科教工作座谈会,便是借机提出恢复高考、实现其设想的一个场合,而决定恢复高考,则是邓小平抓教育的“具体措施”。遵照邓小平的指示,1977年8月13日至9月25日,在北京重新召开了1977年第二次高校招生工作座谈会。由于还受“两个

凡是”的束缚,一些人对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持反对态度,教育部主要负责人也表现出消极的态度,会议久拖不决。

9月19日,邓小平找教育部负责人谈话,明确指出“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关于恢复高考,邓小平批评道:“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教育部首要的问题是要思想一致。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你们起草的招生文件写得很难懂,太繁琐。关于招生的条件,我改了一下。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9月21日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后,形势出现转机,招生工作会议在9月25日顺利结束。9月30日,教育部呈送恢复高考的报告。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至此,高考从制度上正式恢复。

过去,高校招生原来是“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恢复高考后改为:(1)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应届高中毕业生都可以报名;(2)具有高中毕业的文化程度才可以报名,而且必须通过大学入学考试;(3)政治审查主要看本人表现,破除唯“成分论”; (4)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

空前的考试

1977年10月21日,恢复高考的消息正式公布,像秋天里的一声惊雷,唤醒了千万个中国青年沉睡的梦。经历过多年的中断和推荐上大学后,广大知识青年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不再操练于他人,不再由出身和关系来决定,而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通过公平竞争来决定。1977年的冬天无疑是中国教育史的春天。从1977年10月21日正式宣布恢复高考,到12月中旬真正进行高考,所有考生和家长都兴奋莫名,整个社会的神经都被高考所牵动。1977年的高考是中国历史上最特别、最壮观的一次高考。十年耽误和积压,一朝汇聚和喷涌。77年的高考,从66届到77届12个年级的学生一起竞争,如果加上当时允许部分78届优秀高中生提前参加高考,实际上有13个年级的人才一同走入考场。

这是一种空前绝后的场景。与考者经历五花八门,

年龄差距大,不仅有兄弟、姐妹、师生同考,还有叔侄、夫妻同考的现象,大家都有一种兴奋、紧张和神圣的感觉。当年在吉林监考的老师裴先生说:“当时没有一个打小抄的。考试结束后,也没有一个说话的,大家都带着神圣的表情离开考场。”虽然,1977年在河北省故城县,还是发生了为县委书记女儿进行的集体舞弊。不过,总体而言,77年的考风还是非常好的。

在中国高考史上,1977年高考有几点是空前绝后的:一是录取率最低、竞争最激烈。起初预计报考者有可能达到二千多万人,原定计划招生20万人,录取率是1%。后来不少省市采取了地区初试,结果这一年全国最后实际考生数为570万人。后来经邓小平提议,国家计委、教育部决定扩大招生,经过扩招本科2.3万人,各类大专班4万人,共扩招6.3万人,扩招比例达29.3%,最后录取了272971人,按考生比例算为21:1,录取率为4.8%。这是中国高考史上最低的录取率。二是有的省区选取一个县,先行举办了恢复高考的试点。由于高考中断多年,大家对高考已十分陌生,为总结经验,广西在1977年11月,在百色举行了恢复高考的试点考试,以便全省正式高考时借鉴。三是由省市自治区组织考试、地区组织评卷。1977年的高考,由于时间来不及,是各地区组织评卷。四是各省考试时间不一。文件规定当年的“招生推迟到第四季度进行”,并未确定具体时间。如北京是在12月10-11日,上海为12月11-12日,福建是12月16-17日,黑龙江则是12月17-18日。五是冬季考试、春季入学。这是中国高考史上唯一一次在冬天举行的高考。《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1977年的新生于明年2月底以前入学。”但大多数省市即使快马加鞭,也未能赶在2月底以前入学,多数高校实际上是在1978年的3月初入学。六是录取结束后临时决定扩招,匆忙复办了许多专科学校,并开始招收走读生。1978年和后来某些年份也有扩招的举措,但1977级的扩招特别匆忙,以至于许多复办的师专没有校舍,临时寄在师范学校开学,甚至借用小学的教室来上课。如福建龙岩师专77级新生在1978年5月初才入学,借用龙岩东街小学的教室上课。二三十岁的青年大学生,使用低矮的小学课桌椅听课,也是中国高教史上少有的奇观。

知识改变命运

1977年恢复高考是一次真正意义的革命,其影响远大于创立高考。所以,2002年高考制度建立50周年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纪念,而2007年恢复高考30周年却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这场不同寻常的考试,不仅改变了27万人的命运轨迹,而且改变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前进方向。恢复高考荡涤了“读书无用论”、“唯成份论”的浊流,为百废待兴的中国大地吹来了第一阵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风。其意义重大而深远,中国的现代化征程,中国教育的复苏,当代中国的崛起,几乎都以恢复高考为出发的原点,由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凡是参加那场考试的人,都是一个伟大开端的见证人。有的当年考生回忆说:“高考重新给了一代人以竞争的机会,它是我们国家恢复竞争活力的源头,当570万满身风尘、满怀喜悦的考生从四面八方、从10亿人中间涌向考场的时候,这个民族的血脉重新开始流通,而我们77级高考人和时代的脉搏在一起,构成她坚韧有力的律动。”

考上大学,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生的重大转折,尤其是对上山下乡的知青而言。这批从3000万被耽误了青春的人中突围而出、久处知识饥渴状态的77级大学生都有一种强烈的求知欲,看到过去无法借到的书籍,就像饿虎扑食般地享受知识盛宴。这批大学生明白命运之神对他们格外眷顾,所以,他们中的多数人对邓小平、对国家和社会也有一颗感恩的心,其中许多人也具有为国家民族勇攀科学文化高峰的使命感,报效国家的使命感也特别强烈。77级以及后来的78级大学生,多数都是从社会走过来的,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大学生中成份最复杂、年龄跨度最大的一群。他们作为恢复高考的受惠者和幸运儿,在学习氛围特别好的时代里成长历练,毕业后填补百废待兴时巨大的人才空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后来他们则成为改革开放的推动者和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中国近二十余年来的经济起飞,追源溯流,与高考制度的恢复和不断改革密不可分。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历史不一定会记得77级大学生具体个人的功名与成就,但一定会记得“新三级学人”整个群体的命运与作为;历史不见得会记得每一年的高考,但永远会记得1977年冬季的那场高考。

(2018-12-10 佚名)